

为改革开放创造有利外部环境

——邓小平以国际视野推进改革开放

□ 董 洁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是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这一提法，既突出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互动转型中所发挥的独特的、历史性的贡献，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世纪伟人的世界影响。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掌舵人”。他曾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条件归结为以下两点：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为了给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坚持以宏阔国际的国际视野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充分体现在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中。

一是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把反对霸权主义、保卫和平视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早在1980年初，邓小平就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反对一切干涉他国内政、企图控制世界事务的大国行为和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的着眼点是团结最广大的国际力量，而邓小平在反复强调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的同时，也多次公开承诺中国永不称霸，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这一边。邓小平的反对霸权主义立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

普遍利益与公平正义的需求，显现了中国对于世界事务的大国责任，带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特色。

二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对于国际事务的一个重点关心领域。邓小平曾说：“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所作为”主要是指中国要对世界格局的走向做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大事，这些大事超越了纯粹的国家利益层面，是对国际社会作出的直接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构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手中。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走上国家建设的道路，亟需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反映这种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因此，建立新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主张建立这种新秩序，是一种鲜明的国际主义作为。邓小平曾向到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建议中印两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并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个准则来指导国际关系。这也是邓小平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贡献的中国智慧。

三是各国共产党要立足于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实现社会主义

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为恢复与社会主义兄弟党的关系，邓小平在实践积极思考党际交往原则。邓小平认为党际交往中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邓小平多次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模式可能存在多样性的思考和认识，突破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模式只能定于一尊的思想障碍，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四是把中国发展好、建设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才能更多地尽国际主义义务，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邓小平曾说，中国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他还说，没

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上就应有应有的地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中国国情的一次重大认知。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大国，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就是为人类作出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还会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邓小平一再表明：我们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里，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

邓小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一方面使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对外形象和风格更为世人所瞩目和赞赏，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国际环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敏锐而科学地判断了时代主题，清醒而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所处的时代方位，着眼于世界可能和平的趋势和中国必须发展的要求，为中国制定出符合新时期发展的外交政策，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的和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共赢”。

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王荷波

□ 张 蔚



王荷波，1882年生，福建福州人，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投身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党的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同年9月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1927年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新成立的中央北方局书记，后因叛徒出卖被捕，于同年11月英勇就义。

王荷波是“开闽圣王”王审知的后代，其家族崇文重教，勤于耕读。他在读私塾时就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名句作为字帖。父亲曾带他去马尾，给他讲述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中法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历史，爱国主义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后因家庭变故，被迫离开家乡，四处漂泊谋生。在海参崴当劳工期间，他遇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彼德罗夫。彼德罗夫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他钳工技术，而且还教他学俄文，向他介绍工人运动的理论，为以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工人运动，组织领导了两浦地区第一次

工人罢工运动。在斗争中，他逐渐认识到，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组织起来才有力量。1921年3月，浦镇机车厂成立“中华工会”，他先后当选副会长、会长。工会成立当天，正好大女儿王晓珍出生，他高兴地给女儿取名为“职工”。同年冬，王荷波代表工会向铁路局提出增加工资、发放棉衣等11条要求，遭到铁路局的拒绝。为了工人群众的利益，他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带领工人，在列车进站之际，赤身卧轨请愿，铁路局答应让工人派代表进京谈判。王荷波只身前往北京面见交通总长叶恭綽，他大义凛然、据理力争，迫使军阀政府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王荷波领导工会斗争的事迹，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慕名来访，并介绍他到北京大学亢慕义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6月，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工会中第一个工人党员。

作为我党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王荷波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本事？大伙团结力量大。我们铁路工人、全国工人都团结起来，就能推倒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他先后领导了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全国工人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

1923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王荷波与毛泽东作为会议代表共住同一栋楼的隔壁房间。此前，王荷波从《向导》《湘江评论》等刊物上学习过毛泽东的文章，毛泽东也从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简报上了解王荷波领导工人运动的做法与经验。两人见面，如旧友重逢，经常通宵

达旦畅谈交流。在毛泽东的引导下，他认识到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大会上，两人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因工作需要，中央增补王荷波为中央局委员。这样，两人又同为中央局委员。在上海成立第四区国民党党部时，国民党右派企图强占主席台，破坏选举。王荷波当机立断，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保证了选举圆满成功。陈独秀批评王荷波的做法，毛泽东挺身支持王荷波，坚持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团结国民党左派。王荷波激动地说，“知我者，润之也”。后来，两人在党的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多次相遇，交流讨论工农联盟等问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4年，王荷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引起轰动，受到了各国代表的赞扬，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争了光。回国后，他借鉴苏联经验，在上海组织起红色救济会，救济因罢工失业的工人和被捕、遇难同志的家属。而自从他领导“二九”卧轨斗争被开除后，家庭生活愈加困难。工人们自发捐钱给他妻子。他发现后，狠狠批评妻子说，“为了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就得牺牲个人的一切”。

为了防止腐败现象在党内滋生蔓延，1927年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当选首任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和其他监察委员们认真学习联共

（布）经验，明确监委的职权，要求监察委员首先管好自己和亲人家属，履行监察职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王荷波向委员们特别指出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并且组织委员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党要管党、教育党员的思想，并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和苏共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内容进行比较，明确了自身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和政治规矩等。他要求委员们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相互监督，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他不仅重视学习借鉴列宁领导联共（布）设立监察委员会的成功经验，而且重视总结党成立以来监察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出党内思想教育和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发挥工人代表大会监督作用、利用报刊加强舆论监督、防止和消除腐败现象等重要经验。由于形势的需要，监察委员们被派到各地领导地方工作。大家通过创办讲习班加强党员教育，查处一些贪腐违纪案件等措施，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到北京政法大学与北京市委同志接头时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绝不泄露党的秘密。临难前，他委托一位可能出狱的难友，对党组织留下唯一的遗言：“请党组织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绝不能走与我相反的道路。”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门外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时年45岁。



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大坞镇仁山村北侧的滕州市烈士陵园内，是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纪念碑高38米，寓意滕、沛、峰三县抗日武装起义及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成立的时间是1938年。纪念碑正面是滕州籍曾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的老战士、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杨斯德题写的碑名“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背面的底座上镌刻着中共滕州市委、滕州市人民政府撰写的《抗战英烈丰碑长存》碑文，全文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

公元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首占京津再犯齐鲁，铁蹄所至，百姓罹难，生灵涂炭。翌年三月，日军进犯鲁南，值此生死存亡关头，鲁南地区共产党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抗日救亡号召，高举爱国救亡之义旗，投入抗日战争之洪流。当时，滕、沛、峰县有志之士应者云集，数月之内集结六百余人，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之下，于滕县南塘成立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委员，王见新任政治部主任，韩文一任参谋长。八年抗战，为民族之解放、国家之独立，义勇总队艰苦卓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英勇杀敌。鏖战抱犊崮，今日寇闻风丧胆；转战微山湖，使伪顽望风披靡。何一萍、渠玉柏、孟昭耀、生碧泉、刘景镇等先烈热血遍洒鲁南大地。李乐平、王右池、李景黄、杨斯德、杨广立、王丹墀等壮士忠心谱写山河壮歌。抗日英烈之赫赫战功，义勇战士之歌歌丹忱将永载史册，其功也可仰，其德也可钦，精神不朽，辉映未来。为继承先烈遗志，传承抗战精神，铭历史而励节操，壮鲁南而兴大业，经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批准，中共滕州市委、滕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并树立纪念碑。碑高三十八米，寓意为义勇队建队于上世纪之三八年，纪念碑兀立于巍巍仁山之巅，上干云霄，下系地维，壮乾坤之正气，寄斯仁于山水。革命先驱，万民景仰，为国建功，浩气长存，抚今追昔，饮水思源，铭记历史，奋发图强，特撰文。勒石永志，纪念此饬。

中共滕州市委
滕州市人民政府
公元二零零八年五月

碑文回顾了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鲁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的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历史，介绍了以何一萍、渠玉柏为代表的先烈事迹和战功。敬读碑文，对抗日英烈之功德倍感敬仰。

组建抗日义勇总队，
痛歼敌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鲁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抗日武装、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抗日烽火燃遍鲁南大地。1938年1月，王见新、李乐平、王右池等人在滕县善壩村创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为抗日培训骨干力量，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120余人的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同年3月，沛县在张光中、张新华等人领导下，组织了渔家武装，创建抗日义勇队。峰县在朱道南、朱玉柏、刘景镇等人领导下，将三支分散的抗日武装组织在一起，合编为峰县人民抗日义勇队。1938年5月21日，滕、沛、峰三县抗日武装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的领导下，集结于滕峰边区的南塘、墓山等地，举行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正式成立第五战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建立及其所进行的一系列抗日活动有效鼓舞

其功可仰
其德可钦

——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碑文敬读

□ 费艳玲

了斗志、震慑了敌人，深受鲁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义勇总队在滕峰边区发动群众，袭击日军，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滕县特支、滕峰边县委，并充实调整了峰县县委，使这一地区的抗日运动空前高涨，义勇总队迅速壮大，滕峰边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这也引起了原来盘踞在这一带的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进而封锁抗日武装的给养，限制共产党的活动。1938年6月，驻滕县东部冯卯的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司令申宪武率3000余人南下羊庄，妄图围歼驻南塘的义勇总队。6月21日，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为粉碎申宪武的联合“围剿”阴谋，调动各路人民武装进行反顽斗争。经4昼夜激战，将集结在羊庄、庄里、北塘的申宪武部一举击溃，取得了反顽作战的初步胜利，义勇总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年仅25岁的何一萍及10余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30余人负伤。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沉痛写下“热血满腔愤义师，锄奸未尽竟长辞”的《吊何一萍同志》。

转战抱犊崮

地方顽固派申宪武得到喘息机会后，又联合地方顽固势力从四面包围滕峰边根据地，抗日武装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下，特委和义勇总队决定撤离滕峰边区，向抱犊崮山区大炉一带转移。时值盛夏，天降大雨，山洪暴发，部队和随军家属冒雨前进，由于道路泥泞，行走极为困难，还不时受到顽军的阻击。部队到达滕东旱河子村附近时，遭到顽匪刘宇华队伍的截击。义勇总队一面掩护随军家属撤退，一面进行自卫还击。担负掩护总队撤退任务的第二大队教导员渠玉柏掩护总队突围后，听到后面仍有枪声，遂带领杨继元等5名队员返回，继续与敌作战。战斗中，杨继元当场牺牲，渠玉柏身中数弹，陷入敌军重围。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渠玉柏与敌军展开肉搏，最后不幸被俘，英勇就义，年仅24岁。义勇总队到达抱犊崮山区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协助边联县组织农救会、妇救会、自卫团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开展斗争，同时打击日、伪、顽小股武装。1939年7月，罗荣桓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到达鲁南，与义勇总队会合，并将义勇总队编入第一一五师序列，进一步巩固、发展了抱犊崮抗日根据地。

为了新中国 ——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